「新青年」雜誌歷史地位之評判

曾心儀

書名：新青年與現代中國
作者：陳國祥
出版：四季出版公司

(一)

「新青年與現代中國」一書是陳國祥先生在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的碩士論文，原名「新青年雜誌對中國文化與政治發展問題的言論分析」。本書可貴之處在於作者具有西方社會科學知識，參考多種專書，以客觀的態度對新青年雜誌作系統性的介紹、分析和評論，陳先生並提出了一些他自己的看法。

新青年雜誌創刊於民國四年，發行到民國十五年。第一卷到第三卷由陳獨秀主編。民國七年改爲同仁雜誌，編輯委員包括：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李大釗、胡適、沈尹默和劉叡輪。輪編制持續到民國九年五月。當時由於陳獨秀在第三國際特派員魏金斯基的協助下，籌組中共中央，中共臨時中央成立後，新青年雜誌成爲其機關報，胡適等自由思想者退出。民國十一年七月出版了九卷六號後，停刊一年。十二年六月改爲季刊恢復出版，由甫從俄國留學回來的瞿秋白主編。以後又改爲不定期刊出版。

新青年雜誌可以說是集結了當時中國學術界第一流的頭腦，他們的文字、理論，深刻地影響了當時代的知識青年，也改變了中國的命運。這本雜誌可以說是中國現代史上最關鍵性的雜誌。距今也不過相隔了五十餘年，然而，若不是具有高等知識份子的身份、同時還熱切關心「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社會變遷的研究工作者；一般人並不因傳播事業的日益發達而易於獲得到民初以來學人筆耕的全貌。資料之不普及，則遑論對歷史做考察、判斷以及推動新的文化運動？這也就是陳國祥先生著此書特別受到讀者重視的原因了。

本書包括：導論、歐美文化爲主導的階段、從歐美模式到馬列模式的轉變歷程、馬列主義爲主導的階段、總結；共分爲五章。

(二)

「導論」章裏談到：中國自十九世紀起遭受列强軍事力、政治力、經濟力的慘痛壓迫，帝國主義者藉著關稅協定，將商品輸入中國內地，破壞中國的手工業，並利用不平等條約在中國設廠，從事直接及間接（貸款、購買股票）的投資，致使中國的農村經濟瀕臨崩潰，民族工業無法成長，整個社會呈現一片紛亂無助。相應於這種變亂的情勢，政治、教育、社會意識的變革也就陸續發生。

「新青年」的知識份子，在當時，思想上處於先進地位，他們不同於清末的維新派人士。由於他們秉持的思想並非在中國傳統文化或社會現實衍生出來，而是從先進國家移植過來，因此，思想與實踐所需的現實條件之間差距甚大。這羣知識份子在當時的社會上是相當孤立的一羣人。他們的思想價值觀念把他們和城市工商業者、鄉村農民大衆、以及鄉紳階級都分隔開來。唯一和他們較接近的是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知識青年。在處於國際情勢和世界思潮遽烈變動的時代，他們的革新運動含有游移變動的潛在性。在巴黎和會後，有些人因看到在理論上標榜民主、人權的英法等國也露出了侵略者猙獰的面目；於是前一時期的理想頓時歸於幻滅，繼之發生了巨大的思想轉變，爲日後投靠馬列主義埋下了一顆種仔。

(三)

在「歐美文化爲主導的階段」裏，作者提到，早在十九世紀末葉，中國的革新派知識份子如梁啓超等，就開始宣揚西方的個人主義概念。梁氏認爲，孔子思想中的權威性階層，不符新社會的需要。嚴復和梁啓超都認爲，國家主權是由個人權利組成。他們把自由思想引入中國，主要是爲了誘導中國民衆的潛力，喚起中國民衆的士氣，以重建及鞏固中國社會。康有爲今文學派對儒家思想的解釋，打擾了儒家正統思想長期以來的安寧。譚嗣同對三綱說喊出「衝破網羅」的呼聲，對當時及後代產生強烈的衝擊。康、梁等雖多方指摘中國傳統，却沒有全面反傳統，仍不放棄改革傳統的可能性。「新青年」的知識份子對傳統和孔教的攻擊却近乎是整體的。

陳獨秀和李大釗都曾把中西文化擺在對立的地位。他們感到中國的傳統社會和文化對個人的壓抑太過嚴苛，阻礙了國人個性的發展，而傳統的名教又和現實社會的需求嚴重脫節。因此，要使中國國權鞏固，先要中國人從傳統文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爲了要達到此一目的，則必須提倡個人獨立自主的精神。胡適也是大力提倡個人獨立自主的一員。在他的倡議下，「新青年」出了「易卜生專號」，翻譯了易卜生的劇本「娜拉」、「國民之敵」等。胡適和陳獨秀均反對新舊思想文化「調和」的主張。胡適說：

「爲什麼要反對調和呢？因爲評判的態度只認得一個是與不是，……調和是人類懶病的天然趨勢，用不著我們來提倡。社會上自然有無數懶人儒夫出來調和。」

「新青年」的知識份子把中西文化看做不可相容的對立物。他們所推崇的新思潮是歐美的：人權說、民主政治、科學、現實主義、實用主義等。他們提倡個人獨立和人人平等的觀念，女權運動的呼聲在該刊創刊號上就被提了出來。這些理想，他們認爲正好和中國傳統思想背道而馳，因此他們全面地反傳統。魯迅發表在「新青年」上的諷刺小說「狂人日記」正好趕上批評禮教的風潮，小說中有一段很犀利的話：

「我翻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總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紙都寫著兩個字是『喫人』。」

魯迅還寫了很多散文，他大致是站在現實生活和

人道主義的立場發言。

縱觀「歐美文化爲主導的階段」，作者對它有如下的評論：

「考察陳獨秀和胡適等人在『新青年』中宣揚個人獨立自主精神的文章，可以發現他們對個人解放的主張，並不像西方個人自由的觀念那樣，是基於個人價值在倫理上的基設。他們最關心的是使中國青年從『陳腐朽敗』的傳統社會和文化中解放出來，建立獨立自主的昂揚精神，做爲建設新的自由社會的尖兵。因此我們可以說，就動機而言，他們把個人價值當手段的態度遠超過把它視爲目的的看法。

他們對中西思想文化採取整體否定和整體肯定的態度，沒有具體地深入分析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利中國生存發展而必需揚棄的部份，以及有利中國發展而可以保存或發揚的部份；對中國生存發展的實際問題也未整體地深入分析。同樣的，對於他們所知道的各種歐美思想文化也沒有從事具體的深入分析，尤其是產生那些思想文化的社會背景和社會條件，以及它們在歐美社會發展過程中各別所發揮的推動效力。」

作者的這段評論很是中肯。這也可以說明，巴黎和會後，「新青年」的知識份子看到他們原來敬爲「導師」者竟兼具了「侵略者」的身份，所產生的憤怒情緒，以致於棄絕它，實爲不可避免的發展軌跡。

陳獨秀等人一面做著民主政治教育的工作，同時討論著如何調和既存政治勢力的利益，以行立憲制度。當時的中國，盛行武力政治，又有三大政治勢力爭權。陳獨秀屈就現實，提倡廢除武力政治和各黨派瓜分權力。但是，這個立憲政治的設想，很快就被現實否決了。民國八年初，北方的段祺瑞政府促使安福國會選舉徐世昌爲總統，徐世昌倡言和平統一，準備拉攏廣州軍政府，舉行南北政府調和會議。這時，「新青年」同仁才發現各黨派的調和只是在瓜分權力，完全不顧國民的福利，根本無法寄望在他們的調和中實現立憲政治。眞是使他們失望至極！

這時，陳獨秀受到杜威在華演講民主政治理論的影響，把改造中國政治的方法，轉移到「地方自治」、「同業聯合」、「直接民治」。然而，這也是個無法實現的夢想：因爲，它須要有負責推動執行的政權，而當時的北洋政府只知奪權分利，目無人民，如何能推動這個「直接民治」的政策呢？

在「歐美文化爲主導的階段」裏，文學革命是該雜誌的主要成就之一。

胡適主張的「八事」，偏重在文學形式的改良。至於文學應表達什麼樣的思想，他沒有明白的主張。胡適立論重點是提倡白話文學。

陳獨秀對文學內容提出較多具體的主張。他的「文學革命論」，一方面來自他對歐洲文學發展史的瞭解，肯定寫實主義的文學思想。另方面，他不把文學看做孤立的事務。他感到革新中國政治必須從革新思想著手，他希望藉著文學革命之助，有效的革除傳統思想文化的遺毒，進而有助於政治革新。

當時，除了陳獨秀和周作人討論文學創作路線問題外，並沒有文學路線的論辯。文學路線的問題是從「文學研究社」和「創造社」成立後，才開始爭辯。

(四)

「從歐美模式到馬列模式的轉變歷程」這一章裏所談大致如下：

歐戰原本只是各民族國家爲求擴張利益而發生的拚鬪，沒有强權與公理的區別。陳獨秀等人却因爲對協約國主要國家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愛慕，而寄望代表「公理」的協約國能戰勝代表「軍國主義」的同盟國。歐戰結束後，他們寄望巴黎和會幫助中國從德國手中收回山東的權益。然而，衰世凱認可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日本又獲得英法兩國簽訂秘約的認可。陳獨秀等原來對英法美好的印象因而粉碎，他們轉而對揭露西方社會和文化缺陷的理論發生興趣。原來是爲了反對資本主義而產生的各種社會主義，在他們看來，都有反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意義，也就可以做爲反抗帝國主義的指導理論。巴黎和會與五四運動並沒有直接地把中國知識份子推上馬列主義的道路，而是使某些知識份子形成了接受馬列主義的準備狀態。

民國六年，蘇俄發生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俄國的革命經驗正好爲中國知識份子提供新的指引。俄國發表的「加拉罕宣言」，宣稱放棄沙皇政府在滿州獲得的一切權益，博得中國知識份子相當的好感，進而對俄共信奉的馬列主義產生興趣。這些知識份子爲了展開積極有效的救國行動，急需參考模式和指導原理，以便取代原先從歐美輸進而已遭到懷疑的種種思想理論；俄共的革命經驗和馬列思想於是佔據了這個遺

缺。李大釗是第一個被人熟知的馬克斯主義者。比起李大釗，陳獨秀走上馬列道路算是緩慢而愼重。陳獨秀與魏金斯基見過面，討論籌組中國共產黨的問題後，他走上馬列主義的道路心志已定。

民國初年時，無政府主義者的勢力相當大，陳獨秀們在民國九年夏季組織「馬克斯主義研究會」時，曾和無政府主義者聯合組織「社會主義者同盟」；同年的九月，他却發表文章開始强烈批評無政府主義。另一個論戰，是針對梁啓超和張東蓀等人的社會主義論戰。

羅素在「中國人的自由之路」裏的一些話，被陳獨秀視爲暗示中國政黨的改造「最好經過俄國共產黨政的階段。因爲求國民底知識快點普及，發達實業不染資本主義的色彩，俄國式的方法是唯一的道路」，「改革之初，需要一萬徹底的人，願冒自己性命的犧牲，去制馭政府，創興實業，重新建設」。羅素的這段話對陳獨秀來說具有鼓舞的作用。

新青年雜誌在李大釗和陳獨秀的帶領下，一步步朝著馬列主義道路前進。到了民國十年七月，中共中央成立，九卷四號開始成爲中共宣傳機關。

(五)

在「馬列主義爲主導的階段」這一章裏，從史料上我們看出中國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的輔導下成立，民國十一年夏季的二全大會後，中共中央的戰略和策略直接受命於共產國際的指揮。卽使是中共的主要創始人，對馬克斯主義和共產國際的歷史都知道得很有限。他們缺乏能力自行決定各種發展和鬪爭策略，甚至連討論和解釋馬克斯主義的能力都沒有。他們以俄共爲理論父母，不管是自行撰述的文章，或是翻譯俄共理論的文章；一切信奉俄共的說法。而當時俄共的理論是經過列寧重新解釋或歪曲過的、不純正的馬克斯主義。馬克斯一生的思想也歷經變遷，人們選取不同時期的馬克斯學說可以發展出不同的馬克斯主義。中共奪取政權的前後，都以列寧、史達林主義爲宗，不曾走向西歐共黨的社會民主主義，也未發展出東歐共黨强調馬克斯青年時代具有人道主義色彩的馬克斯主義。

民國十二年底，國民黨採取聯俄容共政策後，中

共開始在國民黨中採取分化挑撥的策略，希望導致國民黨的政策向左轉，其最終的目的是要將國民革命轉變成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

六

作者在「總結」章裏，把前述的各階段做了一番簡扼的整理和敍述。作者在評論早期「新青年」知識份子的一段話，頗能引起讀者的共鳴——『新青年』的知識份子採取全盤否定中國傳統和全盤肯定西方文化的態度，這種態度失之武斷與輕率。然而，如果我們苛責他們激進的反傳統態度和過度的西化態度，則可能抹殺了他們當時爲了加速思想革新運動的良苦用心。」

民國十六年國民黨清共後，俄共指使中共召開「八七會議」，把失敗責任推到領導中共六年的陳獨秀頭上。陳獨秀反駁說：「我們應該很坦白的很客觀的認識過去以至現在的機會主義政策，都是來自國際，國際是應該負責的」。陳獨秀所說的「國際」當就是扮演著指導角色的「共產國際」吧。他接著承認道：

「幼稚的中國黨還沒有自己發明理論決定政策的能力；至於盲目的執行國際機會主義政策，而沒有絲毫認識與抗議，這是中國黨領導機關應該負責任的。」

他的話，道出了中共黨員能力的薄弱。

作者在書末有言：「五四時代的思想革新和政治改造運動，都有著熱情有餘而認知不足的弊病。救國學問配合不上救國行動的要求，正是近百年中國知識份子未曾擺脫的困局。」

臺大法學院葉啓政教授在序文裏寫道：

「身爲知識份子，應當以何種姿態來獻身於社會和文化的重建，應當以何種理想來引導社會，都是值得我們加以嚴肅的思索的。針對這些問題，這本書給我們許多歷史的啓示。這些啓示恐怕可以說是，除了學術意義外，作者寫這本書的重要意義吧！這也是這個時代之中國知識份子所應當努力去探索的重要課題。」